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黑龙江站话研究

◎陈立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黑龙江站话研究

◎陈立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站话研究/陈立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004-5421-X

I. 黑… II. 陈… III. 北方方言—方言研究—黑龙江省
IV.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091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刘勇勤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我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世界上已经有多达数百上千种的语言或方言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个趋势现在还在继续中。经语言学家们初步调查，世界上现有六千多种语言，在 21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或方言（有人估计大约有 70—80%）要陆续失去它们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优势方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沮丧又十分无奈的事情。语言或方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它们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亡，这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濒危语言和方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或方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它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

1992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CHSH），面对语言濒危现象日益严重的局面，提出了编辑出版一本《濒危语言红皮书》的建议。同年 8 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包含有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尚未研究或尚未充分描述的濒危语言在语法、词典和教科书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1993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该年为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年，呼吁各国政府机构或团体组织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同时把《濒危语言红皮书》的编辑和出版列为科教文组织的直接管理项目；

1995 年 11 月 18—20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定义和概念，以及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会议的论文随后汇编成《濒危语言研究》（*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论文集，于 1998 年在东京出版；

1996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语言政策的国际会议，提出需要研究世界语言现状的问题，鼓励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语言财富，并且敦促有关方面从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对濒危语言方言实施保护和抢救；

1998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的有关机构和语言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提供合作，完成《世界语言报告》并使之能够定期出版；

2001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世界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上，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教授呼吁，鉴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和方言消亡的速度加快，我们应该像关注濒危动物一样地关注濒危语言和方言；

2002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将与美国《发现》频道携手,共同推动保护全球濒危语种的工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以组织活动和播放特别节目的形式,在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人们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意识;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有语言专家、语言社区代表等参加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提出了科教文组织保护濒危语言活动的若干具体建议,要求强化该组织作为语言多样化和语言濒危资料中心的作用。

以上事实都说明,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有关调查研究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极大重视。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这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近年来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一些地方恢复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双语教育;美国的语言学界对一些濒危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过《濒危语言论文集》。英国设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并且于1995年以后多次召开会议,就“濒危语言的保护”这一主题,就濒危语言研究、濒危语言与教育、濒危语言与媒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原居民语言的调查研究,并且明确规定在全国实行多语制,支持原居民的语言和文化,大力推行原居民语言与英语的双语教育;199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西澳大学联合建立了澳大利亚濒危语言论坛,成立了濒危语言中心电子资料库。日本1994年在东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国际濒危语言资料交流中心,1997年颁布了阿伊努文化促进法,直接推动了日本遗产语言阿伊努语的复苏。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都为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众所周知,也有濒危语言的问题。按照我国民族语言学者的初步估计,少数民族语言中,像满语、仡佬语、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不同于畲话)、柔若语、尔苏语、赫哲语、克木语、裕固语、登语、义都语、阿依语、塔塔尔语、普标话等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汉语有濒危方言吗?

大家都知道,汉语有非常复杂的方言。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十类。官话区分布范围最广,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边的扬州、南京,到西边的乌鲁木齐,南北东西纵横几百万平方公里,将近七亿多的人口说的都是官话。这充分体现了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晋语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以及与内蒙、陕西交界的一些市县旗;吴语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赣语主要分布于江西省;湘语主要分布于湖南省;闽语主要分布于福建、台湾、海南,以及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粤语主要分布于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部的玉林、北海等地;客家话主要分布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以及台湾、广西、湖南等地。这几种方言使用的人口都在3000多万人以上,至7000多万人之间。平话分布范围最小,它只通行于广西桂林一带的桂北地区和南宁一带的桂南地区,使用人口只有200多万人。徽语分布的范围也不大,它只流行于安徽南部的十几个县市,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浙江的一些地方,使用人口也只有300多万人。除此之外,汉语还有一

些方言暂时不好归类,例如湘、粤、桂三省区交界的很多地方有一种暂时称作“土话”的方言,它们到底应该归入哪一种方言,方言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汉语方言都不是濒危的方言,其中的很多方言仍然被广泛使用,例如属于吴语的上海话,属于粤语的广州话,属于闽语的厦门话等方言,正在表现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即使使用人口相对已经很少的徽语和平话,也远没有到达濒危状态的程度。那么,汉语还有濒危的方言吗?我们知道,上面所说的十类方言,讲的只是大类,其实每个大类内部包含很多方言,它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同是闽语,福州话和厦门话不能相通;同是吴语,苏州话和温州话互相通话也有很多困难;同是湘语,长沙话和娄底话差别也非常大。所以,我国东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语方言的分歧性。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是主要的,分歧性是次要的。根据汉语方言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给出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当一种语言或方言已经被分化或分成若干个孤立的地区,并处于周围强势语言或方言的包围和影响之中,明显表现了生存活力的衰竭,这种语言或方言就是处于濒危状态。据此,我们可以把现在使用人口非常少,使用范围很窄,受到周围优势方言的强大影响,已经处于明显消亡之中的方言,称为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根据这个说法,大类底下的个别方言,还有某些不好归类的方言,可以叫作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下面举些例子说说。

畲话。畲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及江西、安徽等省区的个别地方。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叫做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叫做畲话。有学者认为畲话是一种超地域的,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例如有的地方的畲话管天气叫“天性”,管天上的虹叫“蛟龙”,管雷阵雨叫“雷公水”,管整座房子叫“寮”,管苍蝇叫“白蚊”,管腋下叫“手镬”,管背部叫“布龙骨”等。我们已经知道的畲话周围的方言,很少有这些说法的。说畲话的人口虽然还有数万之多,但它零散分布,本来就来不及形成一种内部有效一致的方言。这种方言又分别处于浙江南部吴语、福建北部闽语、广东潮汕方言的强势影响之下,目前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自己原有的方言特点,向周围的方言靠拢。很多原来讲畲话的人,现在已经改说当地其他的汉语方言了。

疍家话。疍家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汉族族群,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后来泛指我国广东、广西、海南、湖南等地“浮家江滨”、“以舟为室”的那些水上人家。旧时“疍家”人被视为“愚蠢不谙文字”的贱民,备受欺凌和侮辱,连“疍家”的“疍”也被写作带虫字偏旁的“蜃”。不过,疍家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方言,他们所说的话,跟所在地岸上或陆上的粤语、闽语、湘语等方言大体一致,这样才方便于他们的交际需要。但是,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又使得他们所说的方言带上很多特殊的印记。例如,有的地方的疍家自称“蛟种”、“龙种”或“龙户”,把岸上或陆上的居民称为“旱民”或“地人”;有的地方的疍家管带遮棚的船叫“艇艇”,总称鱼类为“水主”。对猪马牛羊等的叫名也跟岸上或陆上的居民不太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各地疍家所说的方言统称为疍家话。20世纪50年代以

后,各地疍家人陆续从水上定居岸上或陆上,现在真正还过着“以舟为室”生活的疍家人已经很少,知道疍家话、能说疍家话的人更是不多。疍家话确实处于濒危状态了。

正话。广东西南部的电白县,县境内有一种方言叫“正话”。这种方言有自身的显著特点,例如,从结构上不能区分北京话的“被”字句和“把”字句,“我把他打身死”既可以理解为“我被他打了一顿”,也可以理解为“我把他打了一顿”。电白原是明代的“神电卫”所在地,是驻军守卫的地方。正话就是当时来自各地的驻军和官员通用的一种话,据说接近明代的官话,而且使用人数达数万之众,又是当地的权威方言,故称正话,也称“旧时正”。后来,随着卫所中落,正话退出县城,逐渐散落到县城周围的偏远村庄,又因为“旧时”与白话(粤语俗称)的“狗屎”谐音,便戏称这种话为“狗屎正”。这个名称恰好反映了正话由盛而衰,受到冷落真实情况。今天,正话只在北部偏远乡村狭小范围内零散分布,知道正话、还能说这种方言的人口也仅剩六千多人。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一般都会说当地通行的黎话或海话(闽语)、白话(粤语)、艾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他们外出时不说正话。在村里,正话也不是唯一的交际语言,往往是跟其他方言同时交替使用,可自由换码,进行多方言交际。所以正话已经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

乡话。在湖南沅陵西南以及与之相邻的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张家界等地的一些乡镇,分布着一种叫“乡话”的方言。“乡话”就是土话的意思。当地人把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叫做“客话”,又把自己的话叫做“瓦乡话”。“瓦”与“话”同音,“话”就是说、讲的意思,“瓦乡话”就是“说乡话”。乡话的形成和历史演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方言特点非常显著。乡话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方言大不一样,例如有的乡话“你”读如“列”,“耳朵”读如“娘都”,“左边”读如“居比”;词汇上也有很多特别的说法,跟常见的方言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乡话管天气叫“天色”,管平原叫“大坪”,管中午叫“半牯”,上午就叫“上半牯”,下午就叫“下半牯”,管蜻蜓叫“娇娘”等等。因为字音和词语的这些特殊性,使得调查人员在记录乡话时倍感困难。总之,乡话跟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以及苗语、土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都不能通话。但这种方言属于汉语却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划归到哪一大类的方言,现在还在讨论之中。虽然说乡话的人数还有好几万人,而且也相对集中,但是,为了对外交际的需要,说乡话的人一般会湘语或西南官话,有的还兼通周围的苗语或土家话。近年来乡话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交际功能日趋衰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汉语存在濒危方言的事实。当然,濒危的汉语方言远不止就这几个。零散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地的军话,曾经流行于海南岛儋县、昌江一带的儋州话,广西龙胜、资源境内苗族人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伶话,零星分布于黑龙江省古驿道上的站话,还有浙江的九姓话,澳门土生葡人所说的粤语方言等,都应该被认为是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

语言或方言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某些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汉语方言发展历史的规律。但是,这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跟所有其他汉语方言一样,都是我国灿烂文明的

组成部分,它们曾经承载着华夏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体现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记录着汉语发展变化的事实,是非常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保护。我们应该从高度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工作的角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濒危汉语方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使用录音、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收集并记录有关濒危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资料,以及长篇语料和各种口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服饰、文献资料等等,制作濒危汉语方言的语料库和声像库,使之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下去。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汉语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使得一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它们的消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开展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并为此做了一些必要的努力。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为A类重大研究课题。张振兴研究员是这个总课题的负责人。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成为这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濒危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境内的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由本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黄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学者进行调查研究;“濒危方言”主要指的是汉语中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由熊正辉、张振兴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的汉语方言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大约与此相同的时间,时任广东韶关学院院长的林立芳教授,也对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关注,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林立芳教授不但亲自参与韶关地区一些方言系属不明的“韶州土话”的调查研究,而且积极呼吁社会力量对这项学术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由此,本项目得到了韶关市永兆置业有限公司林喜茂先生、慧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林喜发先生、华泰苑置业有限公司姚炎华先生等的资助。我们将把这些资助陆续用于濒危方言的田野调查和出版补贴。借这个机会,我们对林喜茂、林喜发、姚炎华等先生的远见与慷慨表示敬佩和感谢。

汉语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列一个大致的工作时间表,组织有关学者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把这些调查记录的资料整理出版,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开始出版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强调,调查报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主要以记录和保存方言事实、方言资料为目的。我们虽然也为这种调查研究制定了统一的大纲,但是每一种濒危方言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只要能把事实记录、保存下来就可以了。当然,保存方言事实和方言资料还有其他办法,例如制作音像资料,建立语料库等等,这个得根据我们的经费情况在下一步给予考虑。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更多支持。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2005年8月20日

目 录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站话”调查研究的缘起.....	(1)
第二节 “站人”的由来和分布.....	(2)
第三节 肇源县及其境内的站人.....	(5)
第四节 “站话”的形成和传承.....	(10)
第五节 “站话”的濒危性质及研究意义.....	(13)
第六节 音标符号.....	(20)
第二章 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的特点	(22)
第一节 语音特点.....	(22)
第二节 词汇特点.....	(27)
第三节 语法特点.....	(31)
第三章 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音系	(36)
第一节 声韵调分析.....	(36)
第二节 连读变调.....	(37)
第三节 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42)
第四章 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同音字表	(49)
第一节 说明.....	(49)
第二节 同音字表.....	(49)
第五章 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标音举例	(68)
第一节 语法例句.....	(68)
第二节 谚语 歇后语 谜语.....	(82)
第三节 童谣 民歌 民间故事.....	(86)
第四节 站人作品.....	(90)

第五节 录音材料.....	(97)
第六章 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分类词汇表.....	(111)
第一节 说明.....	(111)
第二节 分类词汇表.....	(112)
主要参考文献.....	(23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站话”调查研究的缘起

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共同申请的“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课题于2002年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项目，站话的调查研究是其子项目之一。

站话是指黑龙江省境内部分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以及他们的后裔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

有关站话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仍可谓屈指可数。

郭正彦于1986年在《方言》杂志上发表《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文中简单地介绍了站话的分布情况、形成原因和语音特色。

贺巍（1986）和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图B1中将站话定义为东北官话黑松片的一个小片，并且对站话的分布情况、形成原因和语音特色作了简单的介绍，内容与郭正彦（1986）基本相同。

游汝杰（1993）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站人的来源，简单地描述了肇源县和泰来县站话的声韵调系统，对站话的成因与衰颓的表现进行了一些探讨，还记录了泰来县时雨村站话一些有关人体的词汇。

《黑龙江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刁雁林和朱彤合撰的报道《三百年风雨话“站人”》，文中简单地介绍了记者对站话的听感和少量站话词语。

2002年，在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讨论会（9月7—9日，北京语言大学）上，郭风岚提交的论文《消变中的科洛站话》讨论了站话的形成和分布、黑龙江省嫩江县科洛乡科洛村和科后村站人的语言生活以及科洛站话急遽消变的原因。该文后来刊登于《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2003年第1期（创刊号）。

虽然到目前为止，研究站话的成果不太多，但是学者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站话正处在一种急遽的消变过程中，其消变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调查过站话或对站话有所了解的人，甚至站人们自己都担心：再过若干年，这种方言也许就会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消失。

2004年10月，笔者来到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当地站话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2005年5月，又对肇源县茂兴镇的站话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补充调查，并对当地的“民人话”作了简单的记录，之后又来到该县新站

镇对该处的站话进行了大致的摸底。在两次调查过程中,黑龙江大学的校领导、人事处、研究生处、科研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研究中心,肇源县茂兴镇镇政府的领导和老师们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2003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刘宇始终陪伴我,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包括几位发音合作人在内的许多站人后裔和茂兴镇幸福村村长尹希峰全家给予了热情的款待和支持,尹希峰村长还为我们对民人话的简单调查提供了发音合作,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就是在这两次调查所得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主要的发音合作人有:(1)赵殿锐,男,1942年生于茂兴镇站人家庭,曾任茂兴中学副校长,现已退休;(2)张雅芬,女,1954年生于肇源县新站镇三家街站人家庭,后嫁至茂兴镇,务家;(3)杨柏森,男,1947年生于茂兴镇站人家庭,茂兴镇工商联副主席。

第二节 “站人”的由来和分布

“站人”的由来和分布情况与雅克萨战役及黑龙江省境内清代驿站设置、三藩之乱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雅克萨战役及与站话相关的清代驿站的设立

清朝初年,俄罗斯人入侵黑龙江流域,几度被清军击败又卷土重来,在黑龙江流域建造尼布楚城(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城(今俄罗斯斯科沃罗丁诺)。康熙时俄罗斯人仍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并煽动当地酋长索伦叛附。康熙震怒,几次交涉未果之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兵围攻雅克萨,焚毁木城。清军回防后,俄军重回,又建土城。康熙二十五年夏,萨布素率领清军再次攻打雅克萨。康熙二十八年两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暂时制止了沙俄的侵扰。

在雅克萨战役前夕,为加强北京与黑龙江将军及边境的联系,保障运饷进兵的需要,清政府决定开辟驿路,设立驿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康熙命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宁古塔,与萨布素商议,“自黑龙江至乌喇置十驿,驿夫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马急驰;寻常事宜,则循十驿以行”。《朔方备乘》卷首五载:“十月甲子,遣官勘视设驿地方。户部奏:爱珲至乌拉须设十驿,但设驿之地,不行相度,难以悬议,应俟来年三月雪消,遣户、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员,并令宁古塔将军,选熟知地势者偕,就近派郭尔罗斯二旗、杜尔伯特旗向导各二人,详加丈量。上允之。”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记载,翌年初,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会同宁古塔将军,挑选熟知地形道路之人,勘探线路,自与吉林分界的茂兴苏苏(今肇源县茂兴镇)丈量至爱珲,“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拟设十四驿”,经户部与有关衙门商量,决定“再增设二驿,共设十六驿”。康熙认为,“路途太远”,有些驿站间恐丈量不确,遂令重新丈量,并强调“驿站事宜,关系紧要,凡丈量时,当以五尺为度,精确量之”。包奇奉旨重新丈量以后,回奏:“惟自吉林至爱珲一千三百四十里,中置十九驿。”康熙帝首肯,并命“每驿设壮丁并拨什库三十

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壮丁自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柳条边派出,马牛令盛京户部照数采买送往”(《清圣祖实录》卷 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己巳),但考虑到已在齐齐哈尔、墨尔根二地修城驻兵,且在墨尔根至雅克萨之间也陆续设置了驿站,于是对驿路的走向进行了一些调整。包奇等人按新方案再次勘察丈量,于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奏称:“臣等以五尺为度,由吉林城量至墨尔根,又由墨尔根量至瑗珲城,共一千七百一十一里……拟设驿站二十五处。”户部也于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此具题,康熙帝允准。于是,正式开始了吉林至茂兴,然后经墨尔根再至瑗珲的驿路的设置。驿站、驿路一边建设一边投入使用。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预备停当。二月初一,准时起启”。

起初,这条驿路在今黑龙江境内共设有 19 站:茂兴苏苏站(也称茂兴站,今肇源县茂兴镇),古鲁站(今肇源县古龙镇),塔拉哈池站(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多克多力站(也称多鼎站,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巴彦查干乡太和村),温托珲池站(也称温托欢站,今泰来县大兴镇时雨村),特穆德黑站(又称特木德赫站,今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霍托气村),卜奎站(今齐齐哈尔市),塔哈尔站(又称塔尔哈站,今富裕县塔哈满族达斡尔族乡),宁年池站(即宁年站,今富裕县老街),拉哈岗站(又称拉哈尔站,今讷河市拉哈镇),博尔多站(今讷河市),喀穆尼喀俄佛罗站(又称喀木尼喀站,今讷河市老莱镇),伊拉喀池站(又称伊勒哈站,今嫩江县伊拉哈镇),墨尔根站(今嫩江县城),霍洛尔站(又称霍罗勒、科络尔站,今嫩江县科洛乡),喀尔塔尔济河站(又称喀勒塔尔溪、喀塔尔希站,今嫩江县塔溪乡),库穆尔山岗站(又作库木尔、库木里站,今黑河市西南三站),额叶楞库河站(又作额雨尔、额雨儿、额玉尔站,今黑河市西南二站),黑龙江城(瑗珲)站(今黑河市南爱辉镇)。雍正五年(1727 年)傅尔丹任黑龙江将军时,“以古鲁至墨馨(茂兴)站相距遥远”,又在两站中间增设乌兰诺尔站(今肇源县新站)。以上 20 个驿站中,从茂兴至宁年的 10 站称为下站,归驻齐齐哈尔城(一说茂兴站)的南路站官管辖;从拉哈尔至瑗珲的 10 站称为上站,归驻墨尔根城的北路站官管辖。(参徐宗亮 1985: 卷 2、西清 1984: 卷 2、杨宾 1984)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在墨尔根至雅克萨(今漠河县兴安乡古城岛)之间设置了 25 个驿站。光绪年间这条驿路又增加了 5 站,被延伸至漠河。

雍正十三年(1735 年),清朝政府设城守尉驻于呼兰,并建茂兴至呼兰驿路,中间设有博尔济哈台(今肇源县头台镇)、察普奇尔台(今肇源县二站镇)、额尔多图台(今肇源县三站镇)、布拉克台(今肇东市四站镇)、扎拉和硕台(今肇东市五站镇)。

站话的分布与上述驿路和驿站的设立关系密切。《中国语言地图集》图 B2 中说:“站话小片零散分布于黑龙江省西部的肇源、肇州、林甸、齐齐哈尔、富裕、讷河、塔河、嫩江、呼玛、黑河、漠河等县市的部分地区。”确切地说,站话就是以上述驿路上清代所设的驿站为中心,大致呈现一种岛链式的分布态势。

二 三藩之乱与站丁的来源

清人杨宾的诗句“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梢”是对上述驿站站丁来源的极好概括。

清廷入关之后,为了对付义军及南明政府的反抗,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从事招抚及武力镇压工作。在入关之初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顺治六年又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封耿仲明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后其子继茂、孙精忠承袭。这就是所谓的“三藩”。

三藩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危及国家的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尚可喜以年事已高,上表请求告老辽东,而欲使其子之信继续留镇广东。早就意图撤藩的康熙皇帝趁机命其父子率属下兵丁家小同撤。吴三桂、耿精忠不得已联同上表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的态度,康熙帝亦一一照准。吴三桂遂于当年11月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倡言“兴明讨虏”。吴三桂军以破竹之势,直冲湖南,进犯四川,一时间西南全部、东南沿海以及中原、西北一带都骚动起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

三藩虽起兵反清,然彼等投降外敌,早被汉民唾弃,故拥之者寡。清廷采取以汉制汉、抚剿并举的策略,极大地孤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的王辅臣和福建的耿精忠先后投降清朝。次年,广东的尚之信也俯首于清。康熙十七年,吴三桂起兵六载,年已67岁,然外援日削,败势已成。为排除胸中苦闷,乃于三月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未几即忧愤成疾,八月病死,其势土崩瓦解。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之孙吴世藩自杀,次日所部文武官员1580多人、兵卒5130多人打开城门投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0: 410)

战后,康熙按照“首恶必办,胁从宽典”的原则对吴三桂旧部进行了分类处理。

黄明、陈丹书、吴旦先、华虞臣等134人当即被押解入京,后来黄明、陈丹书、吴旦先等38人被处以极刑,华虞臣等96人按清初处置免死应流人犯的惯例发往宁古塔、乌喇等地给新披甲人为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0: 416)

其他约有五万多降卒被编成六队,发往京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诏曰:“吴三桂亲属、家口(指属下等人),随清军六起进京。”曾寿(1987)记载:“将军等会议,辽东汉人五万余口难以带走,故拟将兵将眷属等编为八队,遂将汉人编为第一队”;“传贝子率第一队于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六启程,将投降之兵将编于六队之中携往。俟其启程后,大将军率汉人八队启程。”(16)“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贝子前锋统领尚纳哈萨克寨、都统锡嘉宝、副都统洪世禄、祖志春、卢禁军、公倭黑皆率每佐领护军一名,由云南启程,驻留上板桥,见军中所携妇孺数千之众。”(18)“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在濛濛细雨中又启程,汉军都统锡嘉宝、公倭黑率骁骑与汉军八队继续前行,四月二十日到达湖南沅州。”(19)另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老档记载:黑龙江宁年驿站的站丁李楷、李枚、李斌、李林弟兄是康熙二十一年春从云南发往北京,尔后辗转发往黑龙江宁年驿站充当站丁。档案中李楷说:“编入锡将军队内,由陆路前来,抵沅州后,随镶红旗洪副都统乘船来京。”

凯旋大军携降卒等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到达北京地区的长辛店、卢沟桥(刘凤云1994: 325)。也许是担心这些降卒留在京城会带来不安定因素,或是考虑到他们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分类遣散:愿意种地者编入保甲,发给土地、耕牛、种子;愿意当兵的,补入营伍。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初七日丁酉,“从御史钱珏疏

言,命各省确查平三藩时投诚者之安置情形,使各得其所。愿在他乡入籍者,写明作何生理;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给田亩开垦;愿为兵者,补入营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0: 496—497)。在被遣散的吴三桂部卒中,有 884 户被发遣至盛京(今沈阳)兵部,驻扎在尚阳堡(今辽宁省开原市清河水库淹没区)、柳条边(今长春市)等地。1913 年出版的清末魏和声所编《鸡林旧闻录》记载:“及康熙时,云南既平,凡附属吴三桂之滇人,悉配戍尚阳堡,在今开原边门外。”这些人中一部分被编入汉军,直接参加了雅克萨战役,其余被分到各驿站任站丁,成为黑龙江境内站人祖先的主体。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记载,派驻各驿的驿丁,最初“拟由盛京沙河站等驿内摊派”。但是,盛京方面因路途远,困难多,题请另派。于是,康熙帝下旨:“墨尔根至彼端(黑龙江城)所设之五驿查索伦、达斡尔之贫穷者,令其驻驿;墨尔根至锦州俄佛罗之二十驿,既然由盛京沙河站等驿人员内摊派困难重重,即查抄没户人,令其驻驿。”可见,上五驿即黑龙江城、额叶楞库河站、库穆尔山岗站、喀尔塔尔济河站、霍洛尔站驻驿驿丁“由当地索伦、达斡尔人中拣选”(这可能是站话在北部驿站较为淡薄的原因之一);而“锦州俄佛罗至墨尔根二十站驿丁,皆属重大罪犯,因圣主仁慈免死,被派往各驿站”。这些“重大罪犯”、“抄没户人”指的就是被派往这些驿站的吴三桂旧部。

1927 年版《奉天通志》载:“台丁、站丁等项旗人均系清初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每户出一壮丁,叫站丁;“台丁、站丁云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叛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张佰英《黑龙江志稿》:“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判故谪充山海关外,旋由关外各站调来江。”(卷 11 经政·氏族,第 7 页,1933 年版)此外,《黑龙江述略》称:“站丁始于康熙,系逆藩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例不准应试服官。唯所授官田虽有定则,而荒漠散漫,无人勾稽。”(卷 2 建置,第 19 页。光绪辛卯仲春石埭徐氏观自得斋校刻本)近人魏毓兰在《龙城旧闻》中也写道:“站丁多云贵人,清兵败吴三桂所俘男女,发遣极边,由山海关内外各站,匀拨来江,充邮卒、当苦差、世为站丁,不与满蒙施通婚姻,服农力作……”

第三节 肇源县及其境内的站人

站话的分布涉及几十个驿站,仅茂兴至爱辉的 20 个驿站就绵延一千多里,由于条件的限制,目前很难对各站的站话进行大规模的详细调查。我们选择了肇源县茂兴镇一带的站话作为本次调查的重点对象,因为“就整条驿路来看,站话在北十站较淡薄,在南十站较明显。在南线又以茂兴一带保留较多”。(游汝杰 1993)

一 肇源县地理、历史、语言概况

(一) 肇源县地理概况

肇源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为大庆市辖县。南北狭窄,东西伸长。东临肇东市,东南接双城市,南与吉林省扶余县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隔江相望,西与吉林省

镇赉县和大安市仅一水相隔,北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大庆市区、肇州县毗邻。总面积 4198 平方公里。人口 45 万,以汉族居多,境内有义顺、浩德、超等 3 个蒙古族自治县,还有满、回、朝鲜等 17 个少数民族居民(含外国人入籍者)。县政府驻肇源镇。

肇源县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地势低平。嫩江和松花江流经西南和南部边境,境内多沼泽,草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气候,春秋两季多大风。年平均气温 4℃,年降水 403 毫米。通让铁路和 203 国道呈南北向穿越境内。

(二) 肇源县历史概况

据对“白金宝文化”等遗址的发掘考证,商周时代县境属女真人建立的肃慎国。秦汉时为秽貊地。后汉三国时属扶余国。北魏时属勿吉国。晋代属豆莫汗国。北齐时属豆莫娄(也作“达莫娄”)国。隋唐时,东部沿松花江一带为黑水都督府管辖,西部嫩江流域属室韦都督府管辖。辽代属东京道捏刺拿古部,契丹二十部牧地。

1112 年发生于今茂兴镇境内的辽金出河店之战,开创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大业,故金天会八年(1130 年)在此建肇州。《金史》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金承安三年(1198 年)肇州由防御州升为节镇,五年置漕运司,贞祐二年置招讨司。

金泰和二年(1202 年),成吉思汗用兵,占据郭尔罗斯部;1214 年成吉思汗将这一带封给其三弟哈布图哈萨尔作为世袭牧地,蒙古族人开始来此定居繁衍。至元三十年(1293 年),朝廷在境内八里城建立肇州。元贞元年(1295 年)设肇州屯田万户府,隶属辽阳行省开元路。

明代县境属奴儿干都司撒察卫(三岔河卫)。洪熙元年(1425 年),兀良哈三卫之一福余卫酋长蒙克塔斯哈喇徙居嫩江,自号科尔沁,占据松嫩平原后即将所部分封为从属之几部,各以其宗族兄弟为首长,兄弟同牧,县境属郭尔罗斯牧地。

清顺治五年(1648 年),郭尔罗斯部设前、后二旗,哈布图哈萨尔的后代布木巴因军功被封为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镇国公爵,公府初驻榛子岭(今肇东市境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朝廷在肇源城置肇州直隶厅设同知衙门,管辖今整个“三肇”(肇源、肇东、肇州)地区,开始实行蒙汉分治。

1913 年,肇州厅改称肇州县,隶属龙江道,县城设在今肇源城,仍是蒙汉分治。1932 年,因洪水泛滥,县公署迁往“老城基”(今肇州址)。1934 年 12 月 1 日蒙汉分治制度正式结束。1935 年,郭尔罗斯后旗辅国公府由肇东四站老爷屯迁至肇源城,仍实行旗制,隶属滨江省。1945 年 12 月 20 日,郭尔罗斯后旗民主政府成立,隶属嫩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

1949 年 5 月 5 日,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郭尔罗斯后旗隶属之。1956 年 4 月 24 日,经国务院批准,郭尔罗斯后旗改称肇源县。1958 年 8 月 27 日,肇源县隶属松花江专署。1965 年 6 月 14 日,松花江专署改为绥化专署,肇源县随之。1992 年 12 月,肇源县划归大庆市管辖。

(三) 语言概况

肇源县境内先时为蒙、满等少数民族的牧地。随着康熙年间驿站的设置,站人成

为进驻这一带的第一批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其后，站话逐渐成形，于是在肇源县境内形成了满、蒙、汉三种语言和文字并行的局面。晚清时期，外来流民大量涌入，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方言各异，但大体上都操汉语的官话方言。他们的方言逐渐融合，形成了东北官话的分支（归属哈阜片肇阜小片），并且在日渐消变的站话面前逐渐取得了强势地位。

蒙古语在肇源县境内曾经占据优势地位，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满语和汉语的影响，已经夹杂了许多满语和汉语的成分，与较远地区的蒙古族人所说蒙古语存在较大的方言分歧，谈话时有不便之感。蒙古语只限在本民族中使用。蒙古人一般都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对外交往时均操汉语。

境内满族人已改操汉语。年龄较大者充其量也仅记得少量的单词。

二 肇源县境内清代驿站的设置情况

清代在今肇源县境内先后共设置了6个驿站。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辟的通往瑗琿的驿路在今肇源县境内长167里，设有茂兴、古鲁两站。茂兴站详见下文。古鲁，满语“高埠”的意思，一说是蒙古语“古尔班禅连”的简称，意为“三个泡子”。乾隆年间改名古楼站。民国以后改称古鲁乡、古鲁区，1958年以后称古龙人民公社、古龙乡，今为古龙镇。该镇位于县境西北部，距县城77公里。

雍正五年（1727年）增设的乌兰诺尔站，也称新站。乌兰诺尔，蒙古语“红色泡子”的意思，因遍布碱蓬植物群落而得名。地处县境的西北部，距县城74公里。

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成的茂兴至呼兰的驿路在今肇源县境内长192里，涉及3个边台站，它们是博尔济哈台（也称头台站，今头台镇）、察普齐尔台（蒙古语“立陡的崖子”的意思，也称二站，今二站镇）、鄂多尔图台（蒙古语“有宝的地方”的意思，也称三站，今三站镇）。站丁均由附近各站拨出，如头台张家来自卜奎站、三站尚家来自古龙站、四站赵家来自茂兴站。

三 茂兴镇概况

“茂兴”为蒙古语，产生于明朝晚期蒙古族游牧生活，文献中有“茂兴苏苏”、“墨馨”、“木乌苏”等汉译名称，意思是说这个地方的地表水苦涩不好喝。茂兴今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集镇。该镇位于肇源县西部，距县城50公里，今下辖11个行政村，总人口2.3万，其中站人后裔约占三分之一。

（一）茂兴的交通状况及兴衰

茂兴位于清代由京城经山海关、吉林、伯都讷、齐齐哈尔至瑗琿的交通大动脉（即所谓御路或进贡路，俗称大站）之上，是从吉林进入黑龙江以后的第一个驿站。据说，茂兴至宁年的南路下十站和茂兴至呼兰的各台站，都统归茂兴总站官管辖。

茂兴往北，可以沿着御路到达齐齐哈尔，再经墨尔根等地通向瑗琿城，也可从齐齐哈尔出发，沿着雍正十年（1732年）开辟的驿路通向呼伦贝尔。

茂兴往南有三条主要的通道：（1）东道。渡过松花江（据说清廷在茂兴南面的松花江上设有六条官船）后继续往南就到了伯都讷站（今扶余县北伯都乡），经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过威远堡边门，到奉天（今沈阳市），直至京城。此为御路，“多为